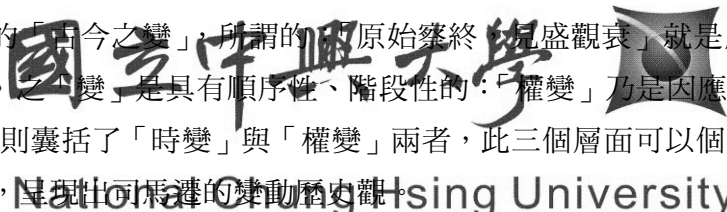


# 時變、權變、世變——論《史記》之「變」

陳詠琳\*

## 摘 要

《史記》文本裡的「變化」內涵，大致上可分為「時變」、「權變」、「世變」三個層面。第一層面的「時變」表明時序所造成的變遷，不論是自然或人文現象，都會隨著時間隱微改變。第二層面的「權變」是人們為了解決「時變」所帶來的異動，權衡之後的應對方式。第三層面的「世變」為三千餘年的歷史演進，亦是最常被論及的「古今之變」；所謂的「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就是屬於此範疇。故知《史記》之「變」是具有順序性、階段性的：「權變」乃是因應「時變」而產生，「世變」則囊括了「時變」與「權變」兩者，此三個層面可以個別獨立，也可以相互融通，呈現出司馬遷的變動歷史觀。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時變、權變、世變

---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 Change in Time, Change through Adjustments, and Change as History — On the Conception of “Change”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Chen Yong-Lin\*

##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changes, i.e. *shìbian*, *quanbian*, and *shìbian*, that constitute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conception of “Change” (*bianhua*) in the *Shiji* or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hile *shìbian*, which is always translated as the change in time, refers to changes that take place in both natural and human world, *quanbian* can be considered making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when facing varieties derived from changes in time. *Shìbian*, as different from the two kinds of changes mentioned above, is said to be equivalent to what’s called *gūjin zhi bian*, which refers to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over three thousand years in which successors are able to observ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yriad things from their beginning and ending. In short, the conception of “Change,” which functions as realizing Sima Qian’s dynamic view on history, is taken in the article as something intensionally gradational, where *quanbian* arises in the course of *shìbian* and *shìbian* is at the same time constituted.

**Keywords:**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Change in Time, Change through Adjustments, Change as History

---

\* Adjunct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 時變、權變、世變——論《史記》之「變」

陳詠琳

## 一、前言

司馬遷(B.C.145年—?)〈報任少卿書〉曰：「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sup>1</sup> 據此可知，通達歷史變動的軌跡，為司馬遷撰寫史書的主要目標之一，安平秋等人曾列舉「通古今之變」的核心內容，分別是：「時勢之變」、「興亡之變」、「成敗之變」和「窮達之變」，<sup>2</sup> 可惜卻沒有再去深入剖析「變」的內涵及構成「變」的原因。若再回歸文本來看，今本《史記》總共出現 245 個「變」字，<sup>3</sup> 縱使扣除「變色」、「變天」、「變法」等特定性詞彙，「變」字在《史記》中仍佔有一定的份量，除了顯而易見的「變」字之外，亦有「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sup>4</sup>、「無成執，無常形」<sup>5</sup> 等蘊藏在《史記》裡的「變化」、「變遷」、「變動」思想，張大可曰：「『變』是司馬遷樸素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核心。他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在『變』，只有用『變』的觀點才能探究事物的本質和規律。」<sup>6</sup> 指出「變」是一種具有普遍性、規律性、持續性的動態過程，精闢地表現出《史記》之「變」。

近四十年來，以「《史記》之『變』」為研究主軸的學術論著，並不在少數，

<sup>1</sup> 漢·班固等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卷 62（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735。

<sup>2</sup> 安平秋等著：《史記通論·《史記》的創作宗旨》，收入張大可、安平秋、余樟華主編：《史記研究集成》第 2 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66-67。

<sup>3</sup> 本研究使用的《史記》版本為「中華書局本」，其以清朝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為底本，經顧頡剛分段標點、中華書局編輯部整理加工後，於 1959 年 9 月出版，筆者所採用者為 2010 年 5 月第 24 次印刷版。

<sup>4</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貨殖列傳》卷 129（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5 月），頁 3282。

<sup>5</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3292。

<sup>6</sup> 張大可：〈司馬遷和史記評介〉，收錄於張高評師主編：《史記研究粹編（一）》（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1 年 11 月），頁 106。

而其大部分都圍繞在：「司馬氏父子對《易經》『變易』思想的繼承」<sup>7</sup>、「司馬遷筆下『通古今之變』的涵義」<sup>8</sup>及「《史記》變革與循環的歷史觀點」<sup>9</sup>這三大子題的範疇內。雖然從「思想源流」、「撰寫宗旨」、「歷史觀點」等寬廣的視角切入，相對上會得到較具有概括性、整體性的論點，但《史記》文本中的「變化」、「變遷」、「變動」思想，是否可以全然一概而論？恐怕就還有討論的空間。

筆者逐一檢視今本《史記》裡「變」的思想內涵，整理、歸納後，大致上能分為「時變」、「權變」、「世變」三個層面：第一層面的「時變」為隨著時序遷移，所引起的「天地自然」之變動，特點在於：隱微、漸進、持續而不間斷，並以宇宙、自然、萬物等非「人文社會」之產物為範疇。第二層面的「權變」是人們為了因應時弊，而有所衡量的應對方式，特點在於：顯著而具有目的性，藉由人為介入來改變原本順勢發展的軌道，以「人文社會」為範疇。第三層面的「世變」即等同於「古今之變」，乃是歷史發展的脈絡，特點在於：大規模、長時間、影響深遠，涵蓋了「天地自然」與「人文社會」兩大範疇，前賢對此已有諸多研究成果，但對於「時變」與「權變」的解析，就顯得較為稀少，足見目前的研究大多數是用宏觀、俯瞰的角度來探討「《史記》之『變』」。本研究將嘗試使用微觀的角度，從《史記》文本內部來論述「時變」、「權變」、「世變」三個層面，並相互比

國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up>7</sup> 此類型的研究成果，可見於學位論文：吳學哲撰：《論司馬遷與《周易》》（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秦園撰：《司馬遷《易》學與《史記》文學成就》（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李士勇撰：《論司馬遷的史《易》會通》（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單篇論文：房曉紅、淑風：《〈周易〉與司馬遷的變通思想》，《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3期）；金利湜：《略論司馬遷的史學思想與《周易》的關係》，《思辨集》第7期（2004年3月）；趙繼寧：《〈史記〉易學思想研究綜述》，《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6期），此處僅略舉數例。

<sup>8</sup> 以此為題目的研究成果繁多，請見學位論文：劉文星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遷歷史哲學新探》（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1995年）；黃嘉蘭撰：《論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單篇論文：陳桐生：《重評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人文雜誌》（1994年第4期）；林時民：《「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傳統》，《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總34期（2005年12月）；張秀蘭、李波：《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與其文論思想》，《學理論》（2014年12期）等等，難以完全載錄。

<sup>9</sup> 此類型的研究成果，可見於學位論文：劉瑞龍撰：《〈史記〉的歷史之變與歷史之常》（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單篇論文：何世華：《論司馬遷的歷史變化觀》，《寶雞師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4期）；李傳印：《質文替變論：司馬遷「變」的理論內核》，《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3期）；王振紅：《變、通、常：〈史記〉記述歷史的層次性》，《湖北社會科學》（2008年3期）等等，不在此一一列舉。

對這三種「變」之間的關係，冀能藉此對「《史記》之『變』」有個更細緻、更完備的認識。

## 二、時變

「時變」為「《史記》之『變』」的第一個層面，孔子（B.C.551年—B.C.479年）曾將時間比擬為連續且不可逆的川流。<sup>10</sup>基本上，宇宙天地間的萬事萬物都會被時序推移而有所改易，此謂之「時變」。《周易·賁·彖傳》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sup>11</sup>此處的「天文」（以下稱「天地自然」）包含：日月、星辰、寒暑、陰陽、草木、鳥獸等天地之間的自然現象；「人文」（以下稱「人文社會」）則是囊括了：政治、經濟、法律、倫理、文化、教育等人類生活的社會事件。<sup>12</sup>不論是「天地之間的自然現象」或「人類生活的社會事件」，皆跟隨著時間的腳步不斷演進，始終處於「變化」、「變動」的狀態。本節前兩小節分別介紹《史記》的「天地自然之『時變』」和「人文社會之『時變』」，第三小節闡發「時變」所蘊含的「漸變」與「轉變」兩特質，以下便就此析論之。

### （一）天地自然之『時變』

《史記》認為「天地自然」有其規律性的變化，日月星辰持續性地不斷變動，幽邃精微，難以通曉。司馬談（B.C.165年—B.C.110年）〈論六家要旨〉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sup>13</sup>奉勸人們遵循時間的流變與萬物的變化，此為司馬談傳承給司馬遷的道家思維。《史記》文本中關於「天地自然之『時變』」的描寫，還能參考賈誼（B.C.200年—B.C.168年）〈鵬鳥賦〉：「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sup>14</sup>敘述萬物時時刻刻都處在

<sup>10</sup>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引自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等疏：《論語注疏·子罕》卷9，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頁80。

<sup>11</sup>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賁·彖傳》卷3，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頁62。

<sup>12</sup> 林文欽編著：《周易時義研究·時義的思維特質》（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年10月），頁240。

<sup>13</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太史公自序》卷130，頁3289。

<sup>14</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卷84，頁2498-2500。

「變化」與「變動」的狀態，儘管《史記》不是為了要述說此觀念而收錄〈鵬鳥賦〉，但仍然能察覺司馬遷對賈誼這番話的認同。再看《戰國策》記載的蔡澤（？—？）之言：「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sup>15</sup>「物盛則衰」一詞為先秦時人考察日升日昃、月盈月缺所得到的結論，可見《戰國策》的「天地自然之『時變』」亦帶有規律循環的特性，同樣被收錄於《史記》中。<sup>16</sup>綜觀上述，司馬遷並沒有特別去闡發「天地自然之『時變』」，反而只是轉錄司馬談、賈誼、《戰國策》等等文章內容，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史記》真正側重的領域，仍在於「人類生活的社會事件」。司馬遷經由審視宇宙萬物，領悟到「時變」是隱微、漸進、持續不斷的，且帶有一定的規律與循環週期，再把這些觀察的結果，運用到《史記》對「人文社會」的撰寫理路上，此或許才是司馬遷費心鑽研「天地自然之『時變』」的最終目的。

## （二）人文社會之「時變」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李斯（B.C.284年—B.C.208年）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sup>17</sup>指出古代每一個王朝都有各自的治理方式，此並不是蓄意要與前人相左，而是為了因應不同時期的人、事、物。《史記》所呈現的「人文社會」化成，包含「風俗」與「事勢」兩大要素。「風俗」即是一時、一地的風土民情，比如：鄒、魯「俗好儒，備於禮」；梁、宋「重厚多君子，好稼穡」；越、楚「俗剽輕，易發怒」等等。<sup>18</sup>「事勢」則是引導事件發展方向的無形力量，容易被強勢政權所掌控，故司馬遷曰：「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sup>19</sup>因此，「風俗」、「事勢」兩大要素的變化、移轉，將會導致人文社會發生「時變」。

政治的決策者是「人」，人就很難擺脫「風俗」的習染，是以《顏氏家訓》曰：「潛移默化，自然似之。」<sup>20</sup>如同司馬遷所表示：淮南、衡山王的謀反，其實與荆

<sup>15</sup> 諸祖秋編撰：《戰國策集注匯考·秦三》卷5，第1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12月），頁335。

<sup>16</sup> 收錄於漢·司馬遷撰：《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卷79，頁2422。

<sup>17</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秦始皇本紀》卷6，頁254。

<sup>18</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貨殖列傳》卷129，頁3266-3268。

<sup>19</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卷17，頁801。

<sup>20</sup> 北齊·顏之推撰，清·趙曦明注、盧文弨補注：《顏氏家訓附傳補遺補正·慕賢》卷2（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2。

楚地區「僥勇輕悍，好作亂」的風俗息息相關，<sup>21</sup>是知一地之「風俗」可能會成為影響政局的潛在原因。請見《史記·匈奴列傳》記載的中行說之語：「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sup>22</sup>往昔，匈奴的衣食有別於漢人，故不需仰賴漢朝進口，如今風俗轉變，連單于都心儀漢族物品，甚至因此萌生歸降之心。再看〈六國年表〉：「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sup>23</sup>呼籲執政者應當效法與自己時代相近、風俗相似的近世君王。這兩段文獻皆點出「風俗」會隨著時間而改易，乃至牽動整個政治、文化之形勢。

人文社會裡的所有事件當中，最具有大規模影響力者，應當是政權的執掌與更替。「事勢」則為政權強、弱轉換的關鍵與風向球，會跟著時序而滋生變化，最顯著的例子，可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對秦國國勢的記載：「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sup>24</sup>再看同篇末尾所收錄的賈誼〈過秦論〉：「秦以區區之地，入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殲函為宮，一夫（按：此指陳勝）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sup>25</sup>將此兩段文獻互相參照，足見秦國國祚之起落：秦國從西陲尺寸之地興起，自秦穆公以來，勢力日益龐大，而後秦嬴政（B.C.259年—B.C.210年）吞併天下，建立秦朝，卻又被平民起義，氣數殆盡，終至滅亡。這段期間政權情勢的消長，正是一種「事勢」之「時變」。

### （三）「漸變」與「轉變」

人文社會的每個「事件」都是環環相扣的，誠如《史記·平準書》所言：「事勢之流，相激使然。」<sup>26</sup>說明了每個「事件」的演變，皆來自諸多因素的彼此激盪。「歷史」是由人文社會的「全數事件」交織而成，堪稱一個巨大的聚合體，故不容易受到一人、一事、一時、一地、一物的異動而產生驟變。綜理《史記》對「天

<sup>21</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卷118，頁3098。

<sup>22</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匈奴列傳》卷110，頁2899。

<sup>23</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六國年表》卷15，頁686。

<sup>24</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秦始皇本紀》卷6，頁276。

<sup>25</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秦始皇本紀》卷6，頁282。

<sup>26</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平準書》卷30，頁1443。

地自然之『時變』及「人文社會之『時變』」的闡述，可以發現：漫長的時間往往會挾帶著「漸變」與「轉變」二者。「漸變」如同「天地自然之『時變』」，隱微、漸進、持續不斷地依循著「事勢」的脈絡前進；「轉變」則是因為時間的積累而形成，其將會造成「事勢」脈絡的轉向，進而衍生出新的歷史路徑。若以《周易·乾》來比喻「時變」的這兩大因素：「漸變」即相當於〈乾〉之潛龍、見龍、惕龍、躍龍、飛龍五個爻位，依序向上攀升，各個階段的層遞性十分顯明；「轉變」即相當於〈乾〉之亢龍，原先已經抵達巔峰的九五，卻因為氣焰太甚且精力耗盡，無法再度向上攀升，於是轉入頹勢，改變了「事勢」初始的走向。<sup>27</sup>

自從劉偉民徵引《史記·太史公自序》：「故曰（按：指《周易·文言傳》）：『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sup>28</sup>闡明《史記》裡的「變」與「漸」<sup>29</sup>之後，學術界普遍認同《史記》所呈現的時間變化，多半屬於漸進、緩慢的。<sup>30</sup>此處以「秦朝逐步走向滅亡」的案例來說明，〈張耳陳餘列傳〉記載：秦朝統治天下的十餘年，盡以嚴刑峻法治國，百姓委實不堪其擾，陳入武臣稱之「亂政虐刑」，又為了修築長城及對外用兵，過度地勞役人民、徵斂重稅，使得全國「財匱力盡，民不聊生」，<sup>31</sup>故首度揭竿起義的陳勝（？—B.C.208年）曰：「天下苦秦久矣。」<sup>32</sup>足見秦朝的衰敗，乃是積累而成，縱使身懷周公（？-？）之才德，恐怕也無力扶起，<sup>33</sup>這十餘年的「亂政虐刑」，正顯露了秦朝由鼎盛逐步邁向滅亡的「漸變」過程。

「事勢」的脈絡形似一條拋物線，發展到極致就會發生「轉變」，是以盛極必衰、否極泰來，辛棄疾（1140年—1207年）曰：「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

<sup>27</sup>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乾》卷1，頁8-10。

<sup>28</sup> 參見漢·司馬遷撰：《史記·太史公自序》卷130，頁3298。

<sup>29</sup> 劉偉民著：《司馬遷研究·司馬遷的歷史哲學》（臺北：國立編譯館，1975年2月），頁104-105。

<sup>30</sup> 相似的徵引與觀點，可見於周虎林著：《司馬遷與其史學·史記的綜合組織與義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7月），頁227-228；陳桐生著：《儒家經傳文化與史記·〈史記〉與〈周易〉》（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2年9月），頁247；張大可著：《司馬遷評傳·司馬遷的思想》，收入《史記研究集成》第1卷，頁261。

<sup>31</sup> 此處內容為司馬遷借武臣之口所道出。漢·司馬遷撰：《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卷89，頁2573。

<sup>32</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陳涉世家》卷48，頁1950。

<sup>33</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秦始皇本紀》卷6，頁292-293。



化，聖人處之。」<sup>34</sup>南宋距離西漢一千餘年，擁有更多的歷史人物與事件可供參考，遂歸結出「事勢」之盛、衰是相互消長的。關於這一點，司馬遷早已提出：「物盛則衰，時極而轉。」<sup>35</sup>的歷史規律，值得注意的是：《史記》在討論盛、衰勢力消長時，幾乎都只有強調由盛至衰的「轉變」，<sup>36</sup>對於從衰弱往興盛的過渡，讀者就必須透過人物與事件去了解，司馬遷鮮少議論之。除了「物極必反」的「轉變」外，時間若過於久遠，也可能會醞釀出「轉變」，迫使「事勢」脈絡有所轉向，西漢主父偃（？—126年）曰：「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sup>37</sup>這就是時間太過冗長而孕育出的「轉變」現象。

### 三、權變

「天地之間的自然現象」與「人類生活的社會事件」皆有可能引發「時變」，人們為了配合每項變革，勢必也要有適當的對應方式，這就是所謂的「權變」，亦為《史記》之「變」的第二個層面。大體上，「權變」是為了因應第一層面的「時變」而生。本節分三小節，第一小節著眼於《史記》裡擅長權變的「人物」，藉此窺探司馬遷對「權變」的見解；第二小節將範圍拓展到整個國家，視察各時期的執政者如何以「權變」安頓天下，第三小節從相反的視角來切入，倘若沒有導正「事勢」的脈絡，或執行不妥當的「權變」，將會逐漸步入衰亡。

#### （一）個人行事之「權變」

為了在瞬息萬變的先秦時代立足，學者們多有一套對應亂世「時變」的學說系統。儒家方面，孔子被孟子（B.C.372年—B.C.289年）譽為「聖之時者」，<sup>38</sup>又

<sup>34</sup> 宋·辛棄疾〈論荊襄上流為東南重地〉，收錄於明·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禦邊》卷336（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4年12月），頁4378。

<sup>35</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平準書》卷30，頁1442。

<sup>36</sup> 蔡澤曰：「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引自《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卷79，頁2422）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引自《史記·李斯列傳》卷87，頁2547）司馬季主：「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引自《史記·日者列傳》卷127，頁3219）。

<sup>37</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卷30，頁1443。

<sup>38</sup> 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萬章下》卷10，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頁176。

讚揚夫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sup>39</sup>這種因應「時變」來調整行事準則的彈性，確實堪稱「權變」之典範，請見《史記》記載蔡澤曰：「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sup>40</sup>以及趙高（B.C.258年—B.C.207年）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sup>41</sup>描述孔子對於個人的仕進，並沒有太多的堅持，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sup>42</sup>出仕主要是為了施展自己的道義、抱負，但處在現實環境多所滯礙的情況下，<sup>43</sup>就得依據當時該國的風氣和君王的態度來衡量。從孔子身上，可以看到儒者實踐理想與面對現實之間的「權變」。

純以「權變」施行的角度來看，孔子只是消極地隨著「時變」在官場上浮沉、進退。《史記》人物中，另有醫者扁鵲（B.C.401年—B.C.310年）、商賈白圭（B.C.370年—B.C.300年），此兩人俱能配合「時變」來應對每個不同的時局。《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sup>44</sup>記載扁鵲能夠按照各國的「風俗」偏好，制定自己的行醫模式，此固然需要具備全方位的醫療專業，但不可忽視其「權變」的精神，再看〈貨殖列傳〉曰：「白圭樂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sup>45</sup>白圭明察「時變」而善用之，逢低買進貨物囤積，等待市場高價時再行拋售，賺取價差，其他如計然（？—？）、范蠡（B.C.536年—B.C.448年）亦然，當為商賈「權變」之術，是以瀧川龜太郎曰：「觀時變者，商之事也。」<sup>46</sup>

先秦人物雖多，司馬遷卻唯獨挑選縱橫家的「權變」於「太史公曰」論述。相較於孔子對「時變」的依循、白圭等人對「時變」的利用，縱橫家則是刻意去催生、引領「時變」。請看《史記·蘇秦列傳》的「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

<sup>39</sup> 漢·趙岐注，舊題宋·孫爽疏：《孟子注疏·公孫丑上》卷3，頁56。

<sup>40</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卷79，頁2422。

<sup>41</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李斯列傳》卷87，頁2550。

<sup>42</sup> 魏晉·何晏集解，宋·邢昺等疏：《論語注疏·述而》卷7，頁61。

<sup>43</sup> 林憶芝：〈聖之時者—孟子心目中的孔子〉，《鵝湖學誌》總第24期（2000年6月），頁14-18。

<sup>44</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卷105，頁2794。

<sup>45</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貨殖列傳》卷129，頁3258-3259。

<sup>46</sup> [日本]瀧川龜太郎編著：《史記會注考證·貨殖列傳》卷129（高雄：麗文文化事業，1997年），頁1323。

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sup>47</sup>六國原本各自分立，且皆畏懼虎、狼之秦，蘇秦（？—B.C.284年）以口舌促成六國結盟以孤秦，使得秦兵十五年不敢越過函谷關。再看〈張儀列傳〉的「太史公曰」：「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sup>48</sup>司馬遷雖然肯定蘇秦、張儀（？—B.C.310年）過人的才智，卻不滿縱橫家為了一己之私，強行挾帶「權變之術」介入政局，造成各國動盪不安，遂以「傾危之士」稱之。〈太史公自序〉：「聖人不朽，時變是守。」<sup>49</sup>聖人因循著時間的變化與變遷，故能成就不朽，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張儀為群臣所惡，終日惶惶不安，死後蒙受惡名，<sup>50</sup>可見過度的權術，必然會伴隨著禍害。

## （二）君王施政之「權變」

前文已述，「風俗」為「人文社會」化成的重點要素，執政者務必要先了解該時間、該地區的風土民情，《商君書》有言：「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sup>51</sup>把「風俗」與「國本」置於對等地位，並告誡不觀民俗而逕自立法的後果。輔佐齊桓公稱霸的管仲（B.C.725年—B.C.645年）就頗能掌握此項原則，請見《史記》記載的管仲事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sup>52</sup>管仲率先察看齊人的好惡風尚，再針對自己的施政加以「權變」，悉以民心向背為依歸，故鮑叔牙（？—B.C.644）聲稱

<sup>47</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蘇秦列傳》卷 69，頁 2277。

<sup>48</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張儀列傳》卷 70，頁 2304。

<sup>49</sup> 唐朝司馬貞《索隱》曰：「『故曰聖人不朽』至『因者君之綱』，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引自漢·司馬遷撰：《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3293。

<sup>50</sup> 茅坤：「蘇秦、張儀二人〈傳〉，開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觀覽。」姚苜田：「蘇、張皆小人之尤，而張更狙詐無賴。」郭嵩燾：「蘇秦、張儀、公孫衍之徒，知苟利其身而已，得勢則附之，失勢則背之，亦安計人國之為利病何如哉？」分別引自明·茅坤編纂，王曉紅整理：《史記鈔·張儀列傳》卷 41（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11月），頁 284；清·姚苜田節評，王興康、周旻佳標點：《史記菁華錄·張儀列傳》卷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頁 121；清·郭嵩燾著：《史記札記·張儀列傳》卷 5 上（臺北：樂天出版社，1971年3月），頁 263。

<sup>51</sup> 清·嚴萬里校，簡書箋：《商君書箋正·算地》卷 2（臺北：廣文書局，1975年4月），頁 62-63。

<sup>52</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管晏列傳》卷 62，頁 2132。

自己在「寬和惠民」方面，遠比不上管仲。<sup>53</sup>相對於管仲「調整施政，以順應風俗」，趙雍反倒是「變風易俗，以符合王政」。趙武靈王為了擊破中山國，戮力推動「胡服騎射」的禮俗改革，曾曰：「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絺紵，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sup>54</sup>主張聖人會視各地的「風俗」來訂定禮法，甌越與大吳有著不同於中原的服儀規範，但同樣都是為了要帶給人民生活便利。在「胡服騎射」的改革效用下，終於成功擊破了中山國，奠定了趙國強盛的基礎。管仲促進了齊國的富強，趙雍開拓了趙國的疆域，兩人的做法雖有差異，但都是一種透過「風俗」以達到政策目標的「權變」。

一時、一地之「風俗」會化育成無形的「禮」。「禮」若是具體化、形式化，便稱作「禮制」，《荀子》曰：「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sup>55</sup>荀子此處所論述的，即是「禮制」，為執政者治理國家的規範。錢玄曾說：「古代的一切禮制，都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產生、發展以至消亡的。」<sup>56</sup>既然禮制是順著社會脈動而生長的，當然也會隨著社會變遷而變化，《禮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sup>57</sup>在眾多排序當中，最首要的是「合乎時宜」。至於，如何讓「禮制」時時處在「合乎時宜」的狀態下？就得端看執政者對「禮制」的「權變」。漢武帝曾下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sup>58</sup>申明漢朝應當要有一套因應人民需求、依循社會風俗的禮法制度，而不是一味仿效古代的禮制。再對照《史記·禮書》的「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sup>59</sup>可以看到司馬遷認為

<sup>53</sup>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齊語》（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12月），頁216。

<sup>54</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趙世家》卷43，頁1808-1809。

<sup>55</sup> 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議兵》卷10（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7月），頁395-396。

<sup>56</sup> 錢玄著：《三禮通論·前言》（江蘇：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頁2。

<sup>57</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禮記正義·禮器》卷23，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頁450。

<sup>58</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禮書》卷23，頁1160-1161。

<sup>59</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禮書》卷23，頁1157。

「禮制」必須緣人情、依人性而制作，此與漢武帝詔書的理念相同。《史記》書中記載最能夠對「禮制」適時「權變」者，恐怕非叔孫通（?-?）莫屬，其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sup>60</sup>表示上古每個朝代的「禮制」皆有所不同，三代各有因革損益，應該依照時間與民情的改變來訂立「禮制」，雖然司馬遷不齒叔孫通「面諛以得親貴」的性格，亦不得不認同其對古禮的權變與革新，擬定了兩漢「禮制」的雛形，確實可稱為「漢家儒宗」。<sup>61</sup>

〈太史公自序〉：「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sup>62</sup>司馬遷言明撰寫「八書」，動機乃是「承敝通變」，意思就是：當「事勢」長期落入頹勢之後，執政者針對時弊、癥結加以「權變」，以挽救整個局面的衰退。《史記·平準書》：「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sup>63</sup>商湯與周武王承接了前朝崩壞的政局，兩人皆企圖扭轉這股民心疲憊的風氣，一律以「使民不倦」為「權變」的最高指導原則，謹慎地治理天下，縱使如此，也只能夠減緩衰頹之勢。請見周文玖對「承敝通變」的分析：「『變通』不是無條件的，要針對『敝』而變，『變』的結果要使民得到好處，『使民不倦』。司馬遷寫了許多變革的事例，這些變革之所以獲得成功，就是由於適應了這個原則。」<sup>64</sup>此處所謂的「變通」，便是本研究指稱的「權變」，當整個國家社會形勢往谷底跌落時，執政者就得去改革、調整當時的弊病。在經濟方面，劉玉菁曰：「〈貨殖列傳〉則是司馬遷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提出『承敝易變』的具體建議。」<sup>65</sup>可知司馬遷曾在《史記·貨殖列傳》提出對於國家經濟弊端的「權變」方式。而在法治方面，請見〈高祖本紀〉的「太史公曰」：「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sup>66</sup>司馬遷指責秦朝不著手導正時弊，反而還強化了刑罰，荒謬的政策加速了自身的傾覆。反觀漢高祖的「約法三章」、漢初的清靜無為，有效地消弭秦朝嚴刑峻法的高壓統治氛

<sup>60</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卷 99，頁 2722。

<sup>61</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卷 99，頁 2726。

<sup>62</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3319。

<sup>63</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平準書》卷 30，頁 1442。

<sup>64</sup> 周文玖：〈《史記》的「變通」史學思想〉，《齊魯學刊》（1993 年第 3 期），頁 203。

<sup>65</sup> 劉玉菁：〈司馬遷經濟思想探析〉，《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總第 42 卷（2011 年 11 月），頁 74。

<sup>66</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高祖本紀》卷 8，頁 394。

圍，故能「使人不倦」，獲得天道之正統。

### （三）不變之患與變易之失

當「事勢」的脈絡走向下坡時，執政者若是可以正確地「權變」，大致上都還有轉圜的空間，但如果沒有適時地「權變」，衰敗之勢就會不斷累積，終至滅亡，此為「不變之患」。自從陸賈「借秦為諭」上諫漢文帝之後，<sup>67</sup>儒者們紛紛跟進，以致西漢初期瀰漫著「過秦」的社會思潮。<sup>68</sup>司馬遷當然也不例外，其將秦朝失敗的主因歸結為「不變」，請見《史記》記載嚴安（?-?）之語：「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sup>69</sup>講述秦朝若是改善舊有的嚴峻風俗、減輕百姓的負擔，國家或許可以長治久安，無奈秦始皇卻變本加厲地窮兵黷武，北伐匈奴、南攻百越，使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增快了秦朝國勢的敗落。再看〈秦始皇本紀〉：「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sup>70</sup>批評秦始皇、胡亥（B.C.230年—B.C.207年）、子嬰（B.C.240年—B.C.206年）三君主，皆無法醒悟秦朝的種種缺失，惑而不悟，弊而不改，遂使國祚僅僅十五年，就拱手於劉邦，此即「不變之患」。

「不變之患」是因為主導者未施行「權變」，任由「漸變」持續積衰，直到毀滅。《史記》另外有「權變」失當的案例，主導者用不恰當的方式去改易原有的規則，亦可稱為「變易之失」。請參看司馬遷對「晁錯（B.C.200年—B.C.154年）建議削藩」一事的見解：「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sup>71</sup>司馬遷直指晁氏的錯誤在於「不以漸」，

<sup>67</sup> 漢·班固等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賈鄒枚路傳》卷51，頁2327。

<sup>68</sup> 王紹東：〈論漢代「過秦」思想的歷史局限〉，《史學史研究》總第135期（2009年第3期），頁26。

<sup>69</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卷112，頁2958。

<sup>70</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秦始皇本紀》卷6，頁278。

<sup>71</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孝景本紀》卷11，頁449。

當時各國的勢力龐大，固宜緩慢、慎重地翦除諸侯的權勢，過於急躁且大幅度的削減，反而引發了「七王之亂」。司馬遷又曰：「黓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sup>72</sup>晁錯為了報復個人的恩怨，恣意專權，更動法令，被各國諸侯責難時，也不及時補救，故慘遭腰斬之刑。最後再看晁錯父親對他的告誡：「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sup>73</sup>晁氏父劈頭就點出「上初即位」的事實，暗示皇帝權位尚未穩固，此時急躁地進行削藩，必然會引來異姓諸侯的反叛，誠如日本的有井範平曰：「錯之為國、為身計俱疎。吳、楚之事，斷宜分地，而不宜制地，宜漸制驟激。」<sup>74</sup>司馬遷絕非反對削藩，而是批評晁錯不辨時機、不得人和、不擅謀略，才會致使「權變」失利。

不論是個人或執政者，若是以「合宜」的時機、方式來實施「權變」，幾乎都能挽回頹勢，反之，則會加劇「事勢」敗落的速度，此從「晁錯建議削藩」的案例可以見得。除此之外，《史記》亦有記載：憑恃著機巧，一時成功「權變」，卻無法長期恪守其優勢的案例，請見司馬遷之語：「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sup>75</sup>韓王信（B.C.230年—B.C.196年）和盧縮（B.C.256年—B.C.194年）以一時的權謀得勢，而後僥倖遇到改朝換代，取得封地而稱王，表面看似風光，卻受到朝廷的質疑，又常以南蠻、北夷作為援助，遂與中央日漸疏遠，最後只好投奔匈奴。另外請看褚少孫（?-?）評論漢武帝期間的諸侯曰：「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sup>76</sup>封侯者們能以權謀、武力得勢，卻不懂得謙讓，互相爭鬥，最終自我毀滅。這種只圖利一時的「權變」，固然獲取了短暫的利益，卻罔顧長期的人心積怨，此何嘗不是一種「變易之失」？

<sup>72</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袁盎黓錯列傳》卷101，頁2748。

<sup>73</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袁盎黓錯列傳》卷101，頁2747。

<sup>74</sup> 明·凌稚隆輯校、李光縉增補，〔日本〕有井範平補標：《補標史記評林·吳王濞列傳》卷106（臺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3月），頁2426。

<sup>75</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韓信盧縮列傳》卷93，頁2642。

<sup>76</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卷20，頁1059。

## 四、世變

「時變」為現象的考察，「權變」為人事的應對，「世變」則為古今的演變，亦即是整個人文社會歷史的流變，梁啟超（1873年－1929年）曾經定義「歷史」為「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sup>77</sup>藉著記載歷史，達到通曉「世變」的境界，乃是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目標之一，亦是「《史記》之『變』」的第三個層面。「歷史」是人文社會「全數事件」的組合，《史記》記載的歷史時間長達三千餘年，看似複雜而難以預測，但其實仍有一定的跡象可循，此便在本節第一小節討論；於第二小節介紹「世變」之所以產生的規則與定律；第三小節闡發司馬遷對「天運」循環及其週期的看法，並再次探討「天人之際」與「古今之變」關係。

### （一）深察「古今之變」

在撰寫《史記》的過程中，司馬遷察覺到歷史發展具有一條隱伏的脈絡，順著這條脈絡，就可以看到歷史事件的起始、經過、轉折、結局。這條脈絡的變化，在《史記》中稱作「古今之變」。陳桐生曰：「研究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首先要注意《史記》『八書』。」<sup>78</sup>「八書」闡述古今制度的演變，〈太史公自序〉：「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作《平準書》以觀事變」<sup>79</sup>在在可見司馬遷欲以專題形式來梳理、呈現《史記》的「古今之變」。

張大可陳述司馬遷寫通史的目的在於：「系統地總結歷史經驗，借鑑歷史教訓，以求長治久安。」<sup>80</sup>「系統地總結歷史經驗」即是所謂的「通古今之變」。至於，該如何通達「古今之變」？司馬遷把自己爬梳三千餘年歷史演進的心得，濃縮成「原始察終」與「見盛觀衰」兩句。<sup>81</sup>蕭黎曰：「『原始察終』，是指找出歷史問題

<sup>77</sup> 清·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史之意義及其範圍》（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7月），頁1。

<sup>78</sup> 陳桐生：〈重評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人文雜誌》（1994年第4期），頁81。

<sup>79</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太史公自序》卷130，頁3304-3306。

<sup>80</sup> 張大可：〈司馬遷怎樣寫歷史〉，《紅河學院學報》第5卷第6期（2007年12月），頁61。

<sup>81</sup> 〈太史公自序〉：「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筆者將「見盛觀衰」置於下一個小節論述，此處僅簡述「原始察終」。引自漢·司馬遷撰：《史記·太史公自序》卷130，頁3319。



的原委和因果聯繫。」<sup>82</sup>簡單的說，就是要掌握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史記》最足以彰顯司馬遷「原始察終」概念的是「十〈表〉的『太史公曰』」，此處徵引〈秦楚之際月表〉的「序言」為例：「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行仁義十餘世。」<sup>83</sup>說明虞舜、夏禹先有數十年勤政愛民的功績，才獲得上位賞識，禪讓帝位；商湯、周武王得以革命成功，也是有賴於先祖們十餘世的仁義遺風。寥寥幾句話，便把其間的「始／終」、「因／果」、「本／末」交待得清清楚楚。「原始察終」是為了借鏡歷史教訓，不重蹈古人之覆轍，《史記》援引賈誼〈過秦論〉曰：「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sup>84</sup>先王藉由觀察「古今之變」，而知國家長治久安的首要之務為「安民」。再看〈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的「序言」：「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sup>85</sup>漢初，劉姓宗室諸侯日漸坐大，終於在漢景帝時爆發「七王之亂」，卻在三個月內被中央平定，作亂諸侯相繼自盡，兵敗被殺。七位諸侯之所以叛變，乃是因為百年來「親屬益疎」、「諸侯驕奢」的不良風氣，故司馬遷提出「以仁義為本」的省思，冀望後人能以史為鏡，避開類似的禍端，這才是司馬遷深察「古今之變」的真正用意。

## （二）借鑑「盛極之變」

「事勢」發展到極致就會發生「轉變」，司馬遷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sup>86</sup>正如前面「七王之亂」的例子，諸侯們謀反肇因於百餘年來的宗室倫理淪喪。褚少孫曰：「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sup>87</sup>確切掌握司馬遷「物盛則衰」的歷史觀，勸戒人們：功名利祿不可長居，以免招引災難。李斯在仕途最高峰曾經喟然而嘆：「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

<sup>82</sup> 蕭黎：〈司馬遷歷史學的貢獻〉，收錄於張高評師主編：《史記研究粹編（一）》，頁 253。

<sup>83</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卷 16，頁 759。

<sup>84</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秦始皇本紀》卷 6，頁 284。

<sup>85</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卷 17，頁 802-803。

<sup>86</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平準書》卷 30，頁 1420。

<sup>87</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田叔列傳》卷 44，頁 2783。

也。」<sup>88</sup>即使懷有危機意識，李斯卻不曾從官場中脫身，故其末路為腰斬於咸陽。相對地，陶朱公便能反其道而行，《史記》記載其事蹟曰：「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sup>89</sup>遂能全身而退。對比李斯與范蠡的遭遇，足知「盛極之變」，高官厚祿難以恆久。

除了「原始察終」之外，司馬遷對歷史演進的另一個歸結要點為「見盛觀衰」。「見盛觀衰」的意思為：縱使自身處在最鼎盛的時局，還能看到盛世腐敗的另外一面，因此可以預測歷史的轉變。簡單來說，就是看透了「盛極之變」的原理，以下就用強盛一時的楚靈王和項羽為例子，《史記·楚世家》的「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sup>90</sup>楚靈王力圖重振霸業，起初雖然戰績亮眼，但連年的用兵，讓國人苦於繇役、王室眾叛親離，下場為自縊於申亥之家，楚國的國勢也跟著楚靈王暴起暴落。再看〈項羽本紀〉的「太史公曰」：「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sup>91</sup>項羽原先比劉邦強大數倍，自立為西楚霸王，卻在垓下兵敗，自刎烏江，為「盛極之變」之顯例。

《史記》描寫了許多「盛極之變」的現象，主要是為了讓後人借鑑歷史教訓，避免步上相同的後塵。林時民曰：「史公寫史，高妙處即在於能於升平盛世之中，看到史事的核心本質，探查盛衰的關係。」<sup>92</sup>司馬遷生在漢代最昌隆的漢武帝時期，卻能保持「見盛觀衰」的史識，在〈平準書〉揭發當時「役財驕溢」、「爭于奢侈」<sup>93</sup>等亂象，再加上劉徹好大喜功，屢屢發動討伐匈奴戰爭，國庫入不敷出，幾乎耗盡漢初七十年來休息養民的積聚。<sup>94</sup>司馬遷娓娓道出漢武帝盛世背後的黑暗面，而這些黑暗面也透露出「盛極之變」的根苗與徵兆。

<sup>88</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李斯列傳》卷 87，頁 2547。

<sup>89</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卷 41，頁 1752。

<sup>90</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項羽本紀》卷 40，頁 1737。

<sup>91</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項羽本紀》卷 7，頁 338-339。

<sup>92</sup> 林時民：〈「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傳統〉，《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總 34 期（2005 年 12 月），頁 39。

<sup>93</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平準書》卷 30，頁 1420。

<sup>94</sup> 張大可著：《史記研究·司馬遷寫漢武帝征伐匈奴》（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391-392。

### （三）旁徵「天運之變」

《史記》側重的領域，固然在於「人類生活的社會事件」，故從三千餘年的歷史中，歸納出「原始察終」與「見盛觀衰」兩種觀察「人文社會」的演進方式，格外難得的是，司馬遷亦不忘觀察「天地自然」的變化，甚至還把兩者互相揉合，請見〈天官書〉：「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sup>95</sup>述說天運有既定的循環週期：30年為一個小變化；100年為一個中變化；500年為一個大變化；1500年為一紀；4500年為一個完整循環。《史記·天官書》又曰：「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sup>96</sup>日暈、月暈、(日月)蝕、雲、風出現時，往往會尾隨大幅度的「天運」勢力，且與政治情勢關係密切，為「天」與「人」交感的媒介。研究天數者必須精通日、月、恆星與五大行星的運行規則，通達古今，深刻體察「時變」，由此可見，〈報任少卿書〉裡的「究天人之際」其實包括了「天運」以及「天人感應」的思想，司馬遷對此並非全盤接受或否定，其希冀能夠借助已運行數千年的「天象」與「星變」，推測出古今的歷史演變，此正如同他費心鑽研「天地自然之『時變』」，再把觀察結果運用到對「人文社會之『時變』」的理解上，故先言「究天人之際」，而後言「通古今之變」。

「天運」與「天人感應」以外，兩漢亦盛行「三統說」，請見《史記·高祖本紀》的「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sup>97</sup>此段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可以相互貫通：「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sup>98</sup>當時流傳「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而「忠、敬、文」三者終而復始，循環不已。司馬遷並沒有強硬地把「忠、敬、文」三者套到漢朝的政統上，只是再次闡揚「權變」的道理，以此暗示執政者：

<sup>95</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天官書》卷 27，頁 1344。

<sup>96</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天官書》卷 27，頁 1351。

<sup>97</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高祖本紀》卷 8，頁 393-394。

<sup>98</sup> 漢·班固等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卷 56，頁 2518。

應當找到自己所屬時代的弊端，藉此「承敝易變」，才能確保天佑之福。

## 五、結語

「時變」、「權變」、「世變」三者具有層遞性：「事件」會因為漫長的時間而滋生變化，人們為了處理「時變」造成的影響，勢必得有所「權變」，故「《史記》之『變』」的第二層面，大多是為了因應第一層面而產生的。「時變」是一種隨著時序變遷的現象，「權變」則是人們應對的行為，第三層面的「世變」包含了「時變」及「權變」兩者，為司馬遷梳理三千餘年歷史因革損益的成果，「太史公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sup>99</sup>期盼讀者透過《史記》，窺探歷史演進之「始／終」、「因／果」、「本／末」，以作為自己生存時代之借鏡。是知「《史記》之『變』」至少可分為「時變」、「權變」、「世變」三者，若只聚焦於〈報任少卿書〉所謂的「通古今之變」，可能會在細微處有所疏漏。

難能可貴的是，「《史記》之『變』」能夠兼顧「人文社會」與「天地自然」兩個領域。雖然司馬遷是以「人類生活的社會事件」為主體，卻不曾忽略星象、日月、萬物的流變，故能夠把自己或他人觀察「天地自然」的見解、認識，灌注到對於「人文社會」的領悟上面。比如，俗諺所謂的：「古年則移，月滿則虧」一語，啟發了司馬遷「見盛觀衰」、「盛極之變」的想法，成為卓越於當朝的歷史洞見。較為可惜的是，古人尚且無法區分「自然」與「神道」的差別，故在〈天官書〉統理天運的週期與情勢，並且接納董仲舒「忠、敬、文」的三代循環論，以此呼籲執政者務必適時調整治國的方針，以順應上天的指示，足見時代之侷限。

縱使司馬遷未能完全脫離「天人」思想的藩籬，但其對於歷史演變的觀點，卻能保有濃厚的人文自主色彩，故《史記》有諸多「權變」的案例，例如：管仲的觀俗施政、趙雍的胡服政策、漢初的黃老無為，「太史公曰」都給予高度肯定。由「天地自然」到「天人之際」，再到「承敝易變」，可以看到司馬遷試圖從三千餘年的歷史洪流去申明治道，寄望後人能從「通古今之變」中達成制治之原。<sup>100</sup>

<sup>99</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卷 18，頁 878。

<sup>100</sup> 阮芝生：〈試論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收錄於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 3 冊（臺北：華世出版社，1985 年 2 月），頁 217。

## 徵引文獻

### 一、古籍（依照作者時代先後排序）

- 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5月。
- 漢·班固等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0月。
- 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禮記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
-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等疏：《論語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
-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
- 北齊·顏之推撰，清·趙曦明注、盧文弨補注：《顏氏家訓附傳補遺補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4年12月。
- 明·茅坤編纂，王曉紅整理：《史記鈔》，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11月。
- 明·凌稚隆輯校、李光縉增補，〔日本〕有井範平補標：《補標史記評林》，臺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3月。
- 清·郭嵩燾著：《史記札記》，臺北：樂天出版社，1971年3月。
- 清·嚴萬里校，簡書箋：《商君書箋正》，臺北：廣文書局，1975年4月。
- 清·姚苧田節評，王興康、周旻佳標點：《史記菁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
- 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7月。
- 清·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7月。

### 二、近人論著（依照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 （一）專書

- 安平秋等著：《史記通論》，收入張大可、安平秋、余樟華主編：《史記研究集成》

- 第2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1月。
- 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3冊，臺北：華世出版社，1985年2月。
- 周虎林著：《司馬遷與其史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7月。
- 林文欽編著：《周易時義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年10月。
-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12月。
- 張大可著：《史記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年1月。
- 張大可著：《司馬遷評傳》，收入張大可、安平秋、余樟華主編：《史記研究集成》第1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1月。
- 張高評編：《史記研究粹編（一）》，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1年11月。
- 陳桐生著：《儒家經傳文化與史記》，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2年9月。
- 劉偉民著：《司馬遷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75年2月。
- 諸祖秋編撰：《戰國策集注匯考》第1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12月。
- 錢玄著：《三禮通論》，江蘇：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
- 〔日本〕瀧川龜太郎編著：《史記會注考證》，高雄：麗文文化事業，1997年。

##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二) 期刊論文

- 王紹東：〈論漢代「過秦」思想的歷史侷限〉，《史學史研究》總第135期（2009年9月），頁26-32。
- 周文玖：〈《史記》的「變通」史學思想〉，《齊魯學刊》總第114期（1993年第3期），頁38-42。
- 林時民：〈「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傳統〉，《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總第34期（2005年12月），頁35-58。
- 林憶芝：〈聖之時者－孟子心目中的孔子〉，《鵝湖學誌》總第24期（2000年6月），頁1-40。
- 張大可：〈司馬遷怎樣寫歷史〉，《紅河學院學報》第5卷第6期（2007年12月），頁61-65。
- 陳桐生：〈重評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人文雜誌》總第90期（1994年7月），頁80-86。
- 劉玉菁：〈司馬遷經濟思想探析〉，《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總第42

卷第 2 期 (2011 年 11 月), 頁 55-80。

